

人·文·视·窗

许纪霖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新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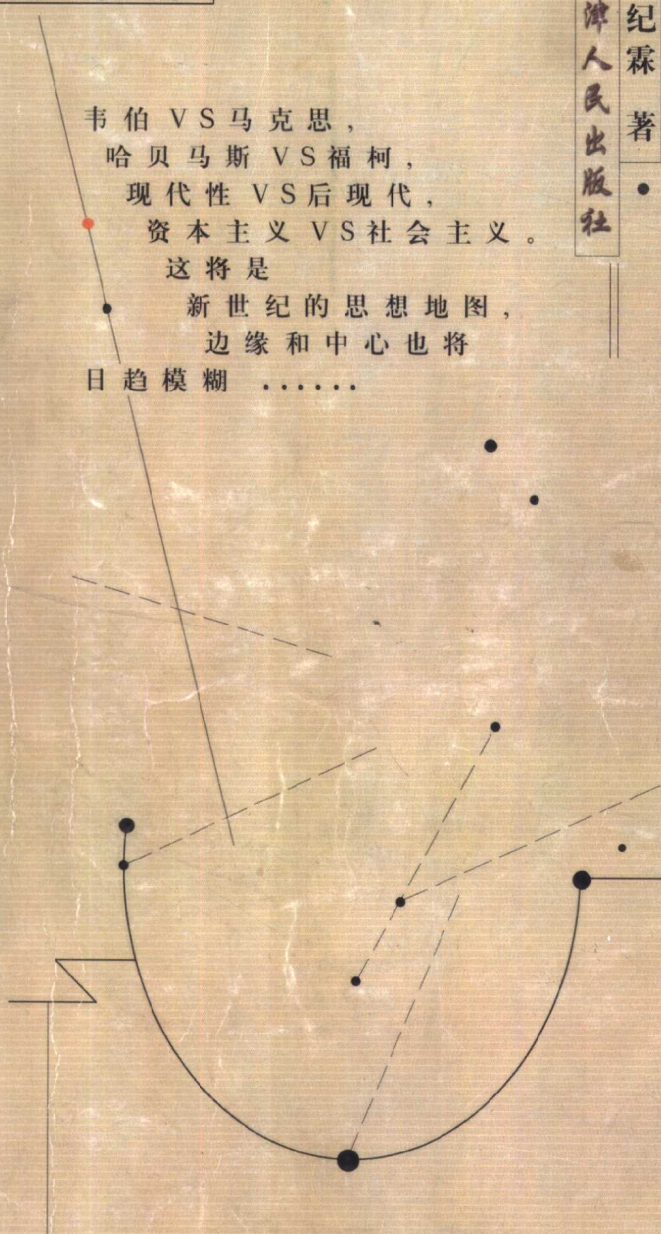


思想地图

韦伯 VS 马克思，
哈贝马斯 VS 福柯，
现代性 VS 后现代，
资本主义 VS 社会主义。

这将是

新世纪的思想地图，
边缘和中心也将
日趋模糊



新世纪的思想地图

许纪霖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的思想地图/许纪霖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1

(人文视窗丛书)

ISBN 7-201-03895-8

I. 新... II. 许... III. 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9779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155号 邮政编码 300020)

邮购部电话: 2714360

网址: <http://www.tjrmchbs.com>

电子邮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河北清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850x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字数: 170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16.00元

目 录

思想者绪语

新世纪的思想地图	(3)
近距离看哈贝马斯	(5)
知识分子词源学意义	(9)
知识分子的历史前身	(13)
对知识分子不同的解释	(15)
知识分子功能的转变	(19)
80年代的“知识分子热”	(22)
9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大挑战	(25)
“公共性”是如何丧失的?	(28)
知识人与道德人	(31)
知识体制内部的公共知识分子	(33)
市民社会及其话语的构建	(36)
分享,还是分割?	(43)
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	

——与 ZOLA 先生的网上对话 ... (45)

世纪人物剪影

一代豪杰“傅大炮”	(59)
瓷器店中的猛牛	(66)
误入宦途叶公超	(76)
走出阁楼以后	(83)
激情的归途	(96)
一代大家胡适之	(108)
我的长辈杜亚泉	(111)
被遗忘的史学大师	(116)
另一种启蒙	(118)

真正的思想者	(123)
大师依然与我们同在	(126)
长久思考的文字	(130)
世间已无戴安娜	(133)
我的大学年代	(136)

都市观察

沪港会议谈酒吧	(151)
东张西望看酒吧	(153)
迷失上海	(156)
上海人与香港人:文化与文明	(158)
两难困境中的殖民历史遗产	(162)
何处寻觅香港梦	(166)
回归前夕看澳门	(168)
在台湾,说上海	(172)
草根化的台北	(174)
寂寞的胡适之	(177)

文化漫评

学术风气与学术体制	(183)
学术研究中的“家法”	(187)
大史识与“无法之法”	(190)
没有皇帝的皇帝制度	(193)
变法中的阴影	(196)
再现整体性理论	(198)
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	(202)
跨越两个年代	(213)
“继绝学”的叩门之作	(217)

“二线人物”的历史	(220)
为尊者不讳	(223)
没有假话的日记	(226)
市场经济中的“封建割据”	(229)
三联的知识分子精神	(231)
美国人的自由理念	(233)
作为镜子的华盛顿	(236)
风雨之中看韩国	(238)
思想的缺席	(241)
《泰坦尼克号》的两个支点	(246)
后记	(249)

思想者 绪语

新世纪的思想地图

如果有人问我,20 世纪最有影响的两位思想大师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马克思他老人家颠覆了一代资本主义,启发了 20 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实践。尽管被他的一些不肖子孙念成歪经,领上错道,依然无损于马克思思想之伟大,有他在,资本主义就一天不得安宁,除了改良,别无出路。马克思的德国老乡韦伯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和主要基因——合理性以及由此派生的科层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并揭示了现代工具理性社会的紧张和冲突。既为现代性提供了合法论证,又给出了反思性的路径。假如没有这两位德国思想泰斗,20 世纪必定是另外一个面目。

那么,到了 21 世纪,像他们那样影响各个学科、风靡整个世界的思想巨人,将又会是谁?我敢斗胆回答:除了两位马克思(斯)幽灵不散之外,新一代领军人物将是哈贝马斯和福柯。

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较量,到新世纪将成为蔓延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论战,这场较量可能改变人们对世界与自我的理解方式,创造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对这一问题缺乏敏感,就有可能被拒签于新世纪的门口。

在这场较量之中,哈贝马斯和福柯成为两大阵营的标志性旗舰。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把守启蒙运动的最后一道大门,以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守护那命系一线的现代性遗产。启蒙死

了,启蒙万岁。在启蒙的废墟上,重建一座经得起后现代众兽无情捶打的新启蒙大厦。另一方面,他要守住的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还有韦伯的两种合理性的紧张和冲突。他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从外线转移到了内线,从体制外转移到体制内。这是一场伟大的战略性转移,犹如孙悟空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接过资本主义的承诺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说,保留资本主义的躯壳,注入社会主义的灵魂。资本主义万岁,资本主义死了。

后现代众神按照其“去中心”的绝对律令,本来不该有核心。然而,领袖是在群众运动中自然形成的,而早死的福柯,却比其他还健在的后现代大将,更显现出领袖的风采。福柯的厉害不仅在于其摧枯拉朽的的拆庙功夫,仅仅论破坏,德里达比他更彻底。但德里达的解构说到底只是一场有赖个人气质的文本游戏,而福柯岂止是游戏,简直拿出了一整套学术的新玩法:有纲领(知识即权力)、有方法(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有范例(历史实证)。福柯是思辨的,也是经验的。思辨有经验垫底,岂能当游戏一笑了之? 21 世纪将是福柯的世纪,福柯死了,福柯万岁。

韦伯 VS 马克思,哈贝马斯 VS 福柯,现代性 VS 后现代,资本主义 VS 社会主义。这将是新世纪的思想地图,边缘和中心也将日趋模糊。论战的阵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身在曹营心在汉,城头变换大王旗。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像 20 世纪的马克思和韦伯,哈贝马斯和福柯将是新世纪的思想掌舵人,无论你从事哪门学科,都无法回避他们。这就是大师。思想界的大师就像自然界的太阳,到处会留下他的身影,他让你燃烧,让你沸腾,也让你冷静,让你思考。

赶快去读大师,就像订购一张去天堂的船票。

近距离看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中午到上海，晚上7点钟，准时出现在座落上海书城的世纪出版集团13楼会议室。这是个小规模的内部座谈，正式参加的上海学者不过七八个。大师满头银发，看上去比我想象得要年轻，虽然在北京轮番出场，但精神依然。我坐在他的对面，终于感到与大师的距离其实并不那么遥远。

座谈的主题是话语民主与民族认同，大师上来一口气讲了近一个小时。听老外演讲，也不下几十次了，但大师毕竟是大师，有着德国学者的逻辑严谨，表达极为准确、干净，一如读他的文章。虽然面对的只是几个人，他依然很有激情，很投入，时而用各种手势强调自己的看法，时而停顿一下，仿佛在心里寻找一个更好的表达。因为坐在他对面，经常有机会与他的眼神交叉，我发现大师目光如炬，但并不严厉，透出一种他所提倡的包容和亲切。

随便说一下，曹卫东的翻译很漂亮，很专业，他私下对我说，这几天，陪着哈贝马斯，累死了。但大师的精神状态好像比他年轻的翻译更好。

提问开始了，包括我在内，总共向他发出了12个问题。专业性都很强，哈贝马斯笑笑说：看来你们都深思熟虑啊！他很认真地一一作答，一个个尖锐的问题，落在他无所不包的体系中，化为一缕缕青烟。

本来大师特地关照,希望让他也提一些问题,与中国同行讨论。当主持人打断大家的提问,要让大师提问时,哈贝马斯说:刚才我与汪道涵先生见面,问题都问完了,你们的问题都很好,还是继续提问吧。——看来,大师喜欢挑战,喜欢对话,他的为学风格实践了他的交谈伦理。

最后,大师终于忍不住,提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这么快,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会接受欧洲的后现代理论,对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感兴趣?为什么?他补充说,在北京座谈时,北京的朋友还不承认中国有后现代。我想,这个问题肯定让他内心有点困惑,甚至有点沮丧,可能在他看来,在中国西哲界,研究后现代和现象学的,比较起研究他的交往理性,实在是太多了。对此,复旦的二张作了一些解释,但大师显然不满意或不理解他们的解释,他进一步反问道:我们要接受后现代,首先要理解后现代,难道后现代理论真的能够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前途?——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我不想隐瞒我对哈贝马斯的敬仰之情,那是一个渴慕思想和知识的人,对一个为人类智慧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思想家情感的自然流露。我深深感到,在中国知识界,可能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知识和智慧的尊严缺乏神圣的敬仰——那种类似对上帝的仰慕之情。如果在中国对思想家的尊重,有德国的一半那样多,我们这个社会又岂止而智慧一倍!当哈贝马斯在我们知识人这里获得尊重的时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权力和金钱面前获得某种尊严。

我们与大师智慧上的不平等,令我们在情感上不自觉地敬仰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人格和理性上依然与他是平等的。对大师最好的尊重,是尽量完整地理解他的思想,并作出批判性

的反思,而不是“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式地,简单接受或批评他的只言片语。

我在座谈会上提的两个问题,就是借助罗尔斯的观点,对他的第三种民主模式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哈贝马斯也认真地作了澄清和说明。不妨在这里公布一下我的现场记录:

问:“我最近正在将您的著作与罗尔斯的著作作比较性阅读。我想问的是,民主的程序和自由的商谈是否必定产生正义的结果?如果不能,比如无法保证阻止纯粹主义的上台,那么是否仍然要像罗尔斯那样,优先选择正义的原则?”

答:“即使有了民主的程序,我们依然无法确切地知道结果是对还是错。程序无法保证结果绝对正确,它能够保证的是对结果的推测。我们可以通过对结果的推测,来不断地修改和调整法律。”

再问:“罗尔斯在与您讨论正义问题时,强调程序正义有赖于实质的正义。您后来研究以宪法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时,是否意味着部分地接受了罗尔斯的观点,有了实质正义的内容?”

再答:“罗尔斯误会了我的意思。程序不是纯粹的,其中包含了规范性的内容,有道德的内涵,包括了私人的自律与公共的自律。”

不过,这样的澄清并没有全然解决我理性上的疑惑,在最近正在撰写的论文中,我依然对哈贝马斯民主理论在正义方面的弱势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尽管如此,我依然尊敬哈贝马斯,并为自己有这样一次当面讨论的机会而高兴。情感上的敬仰与理性上的独立,原本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每一个人对待哈贝马斯,都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和态度,我只

是表达了我的那一份。我只是盼望,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他,都能怀着一份真实、真诚和正当之心,也就是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

知识分子词源学意义

自 80 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中国人的习惯,谈到一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究竟何为“知识分子”?近年来我在几所大学演讲,也经常被听众问到这一问题。虽然在这一领域已潜心研习多年,但依然感到隐藏在此问题背后的复杂性,要作一言而蔽之的笼统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任何一个有生命力、在学界能够长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如理性、文化等等,都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不可能用一两句话概括得清楚。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即将对象中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和概括出来,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必须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里才能加以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回到历史中,对“知识分子”一词作一个词源的追溯和脉络的梳理。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它出现在 19 世纪的俄国。当时,较之西方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本身属于上流社会,但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以这样一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

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的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这批人甚至有可能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些可能是军官,有些可能是教师,有些可能什么都不是,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则有着共通之处。这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源头。从这个起源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语用学的意义上具有着强烈的现实的与道德的批判精神,并且与一种文化的疏离感联系在一起。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法国。1894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一个上尉,由于犹太人的关系遭受诬陷,这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3日在法国L'Auro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后来这批为社会的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从法国的源头来看,知识分子一词实际上一开始是贬义的,但是其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19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主要都是自由的职业者,包括一批文人、作家,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波西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就像哈贝马斯所描绘的,当时他们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主要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问题。这样的知识分子用葛兰西的观念区分,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完全独立的,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与后来阶级化、党派化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很不相同。

因此,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部门管理者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的、西方的概念。但这里讲的“西方”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随着我们对西方的历史、文化逐渐深入地了解,可以发现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虽然他们都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分享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但到了现代西方,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仍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法国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左拉时代的传统。法国的知识界一直是左派的天下,他们常常为理想、信仰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信念而奋斗,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所说的,法国人喜欢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他们很强调自由的积极方面。最代表法国知识分子的,不是理性的、自由主义的雷蒙·阿隆,而是激进的、充满情感力量的保罗·萨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法国总是左翼知识分子最适合的温床,从卢梭一直到当代的萨特、福柯、利奥塔和至今还健在的德里达。比较而言,英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大都在牛津和剑桥里面,主要是一群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从历史上看,由于英国新教改革比较成功,知识分子同宗教、政治的关系就不像法国那么紧张,所以他们也更多地具有一种保守的、妥协的性格,更习惯在经验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上,在体制内部寻求变革的道路。他们也有批判性,但往往是温和的,纠错式的,而不是反体制的。罗素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算是最激进的,但比起萨特来,还是温和得多。德国的知识分子,从历史角度而言他们更多地具有国家主义的气